

#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国内两宋乡村政权与社会控制研究述评

朱奎泽

(南京大学 历史系,南京 210093)

**提 要:** 国内学术界对两宋乡村基层政权及其社会控制问题的研究,在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较前有了大的提高。结合一些重要论著对相关研究情况进行回顾,并就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缺憾作了一定的总结。

**关 键 词:** 两宋;乡村政权;述评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3637(2007)01 - 0134 - 04

关于两宋时期乡村基层政权诸问题的研究,在经历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逐渐起步和获得基础性成就、50年代~70年代境内研究的较为沉寂与境外研究的相对进步后,进入 80年代以来迄今,随着传世文献稽考和整理的深入以及考古文献的不断增长,加之前半个世纪的资料积淀和研究开拓,在对两宋时期(为行文与一些研究论著呼应和统一起见,以下有言宋代者,其时间概念同)整个乡村政治问题研究取得进展的同时,国内学术界就两宋乡村基层政权及其社会控制问题展开了较前专门而深入的探讨,并渐呈兴旺之势。这正应了陈寅恪先生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sup>[1]</sup>

## 一、研究状况

### (一) 专著性研究获得进展

首先,一些通论性的著作或专著涉及了两宋之际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及其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与控制。具体如张厚安等主编的《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和马戎等主编的《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从中国乡村基层政治组织及相关机构建制的历史回顾中,对两宋乡村基层政权及相关问题有一定的阐述;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其两宋部分在阐述社会治安问题时涉及一些乡村治理的情况。朱瑞熙所著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六卷两宋部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对北宋至南宋时期的乡、里、团、耆、都保、保、甲等建制的转承演变作了宏观叙述,从总体上表明其发展变化的线索。陆益龙所著的《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在对中国户籍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探究中,

对两宋保甲制的社会控制问题有简短的叙述。全晰纲的《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列有专章论述两宋的乡村政治组织及其机构建设。赵秀玲的《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则按专题对乡村政治制度及相应组织进行探讨,不少内容涉及两宋乡村基层政治组织及其功能。全、赵二著对整个中国古代乡村制度的探究,就其体系的完整、内容的丰富与视角的新颖而言,较以往多有突破<sup>[2]</sup>。当然,也正由于以通史立意、概论为主,所以针对两宋乡村基层政权及其社会控制的问题所做的论述难免失之简略,深入程度也不够,一些具体问题及其结论尚有商榷余地。大体看来,通论性的著作或多或少都有类似情况。

其次,直接针对两宋社会进行相关研究的专著,涉及了乡村政治制度、组织及社会控制问题。其中,王曾瑜的《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通过对户口的分析,提出户口分类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两宋的乡村社会阶层及相应的社会管理,对一些建制变化以及组织人员的对应功能有不少阐述,其中所言之关于两宋乡村组织体系和建制问题变动不居的说法,颇具启发性。有助于对乡村基层政权问题的理解。王棣的《宋代经济史稿》(长春出版社,2001年版)在较为集中地探讨两宋乡役问题时,对部分乡村政权组织及其社会管理的职责、功能等有独特的见解,一些结论虽有商榷余地,但分析视角值得借鉴;林文勋、谷更有的《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着重从唐宋时期“富民”阶层的崛起及其参与乡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管理与控制的问题进行了较有价值的探讨。谷更有的《唐宋国家与乡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主要从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

和农民生活及心态变迁的角度入手,涉及唐宋变革期乡村政权及社会控制问题,视角新颖。而关于两宋社会、王安石变法以及役法变化的一些论著也对此有不同程度的涉及,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细表。

## (二)专题性文章不断增加

**基层建制与区划:**吴泰《宋代“保甲法”探微》(《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一文论及保甲法实施后宋代乡村统治体制的变化。他对保甲法实施前后的乡、里、管、村、都保等乡村组织的性质及其统属关系的梳理很细致,但对个别组织如乡、管性质及其变化的认识,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郑世刚的《宋代的乡和管》(邓广铭、漆侠主编:《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以北宋时期的情况为主,认为宋初乡、里已混淆为一,开宝废乡令后,“乡”只是作为实施财税征稽的单项行政建制而存在;同时对“管”的组织体系及其职能进行了阐述。王棣在郑文对乡的认识的基础上,发表了《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一文,对传统的乡、里两级制的说法提出质疑。他认为两宋之际乡只是县以下的一级财政建制,与里不存在统属关系。夏维中借鉴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思路所作的《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与王棣进行商榷,认为乡里制的崩溃与乡都制的确立是两宋乡村基层组织演变的基本趋势,阐明乡渐次成为一种地域单位和都成为乡村基层建制的主流,这是很有启发性的。此间的商榷虽视角各异,结论有别,但共同为两宋乡村基层政权问题的相关探究拓展了思路。王增瑜先生在《宋代社会结构》(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一文中对宋代乡村基层政权建制情况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对乡、里、管、耆、都保的实际功能及其演变的过程作了勾勒,并对一些乡村组织的区划关系也作了一定的论述。梁建国的《北宋后期的都保区划》(《南都学坛》,2005年第3期)对北宋后期都保及其在行政区划中的发展变化进行了较前更清晰的讨论;《北宋前期的乡村区划》(《史学集刊》,2006年第3期)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重新加以审视,对北宋前期的管、乡、里、耆等乡村区划逐一作了考辨,并对相关的职役人员,如里正、耆长等也有论述,文章在材料的运用上较有突破。《南宋乡村区划探析》(《烟台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则对南宋之际乡村政治组织及其相应的行政区划作了进一步的探究。以上文章对两宋之际乡村基层建制与区划问题的探讨,在一些问题上有了深入,研究的思路也颇有启示意义,当然也或有结论上的片面或细节上的疏忽。

**社会控制:**李禹阶的《朱熹的家族礼仪论与乡村控制思想》(《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4

期),对朱熹这一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从其维持国家统治秩序的一面出发,阐述了他对乡村社会控制的思路和作法,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刁培俊的《宋代国家权力渗透乡村的努力》(《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认为宋代国家政权从户等制、乡役制、保甲制等方面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并对乡村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张文的《对流民的救济与安置:宋朝社会控制的实践途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对对流民的救济与安置的探索为出发点,对宋代通过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实施社会控制的作用作了一定的分析,视角新颖。

**基层势力与政权的互动:**王善军的《强宗豪族与宋代基层社会》(《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就宋代豪族势力在对官方控制乡村社会的过程中所起的消极作用进行了探讨。谷更有、尹子平的《宋代豪民与官吏勾结对国家的内耗》(《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对宋代豪民势力猖獗的作用及其造成国家内耗和民怨沸腾等问题作了考察,其中涉及的诸多因素是与乡村政权的社会控制功能密切相关的。刁培俊的《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2期),探讨了宋代乡村精英群体的构成及其在宋朝社会中的作用与影响;《宋代的富民与乡村治理》(《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对富民阶层及其在充任乡役的过程中所发挥的社会协调与控制的作用进行了论述。这些论作表明学界渐次注意国家政权与基层势力的互动问题。

**职役制与行政头目:**赵英的《试论北宋职役制度》(《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在对职役制度的探讨中涉及了乡村治理的问题。王棣就两宋时期的乡书手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论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中的乡司》(《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宋代乡司在赋税征收体制中的职权与运作》(《中州学刊》,1999年第2期)、《从乡司地位变化看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宋代乡书手初探》(张其凡、陆勇强主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文围绕其所认为的乡是作为县以下的一级财政建制的立论出发,对乡司在赋税征收方面的职能及由此所涉及的管理体制的变化有较细致的探讨,虽其立论已有商榷问题,但就对乡司的探究而言,是有积极进展的,特别是对宋代乡书手由乡役人转化为县吏的过程及其职掌和运作流程的考察,在静态研究中融入了动态研究,颇具启发意义。雷家宏《略论宋代乡役的职责》(《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探讨了乡村行政头目在乡村政治、经济、司法、治安等方面的职责。刁培俊也对宋代的乡司问题有较为详细的探究,先后有《南宋乡司在赋役征派中的违法舞弊问题》(《邢台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对南宋乡司的演

变、赋役征派中的不轨行为及对乡治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分工与合作:两宋乡役职责的演变》(《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对两宋之际里正、户长、保长、甲头等乡役人员职责的演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在官治与民治之间:宋朝乡役性质辨析》(《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对宋代乡役人员的设置、性质及社会作用作了相应的阐释。童圣江的《唐宋时代的里正》(《唐宋变革论》,黄山书社,2006年版)在对整个唐宋之际里正的发展变化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对里正一职在两宋之际的职责变化进行了探究,对里正差役化的分析较有见地。

除上面所述多直接针对两宋乡村基层政权诸问题的研究情况外,学术界还有一些关于赋役、宗族、教化等方面的论著也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且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可参看相关评述,兹不一一列举。另外,一些学位论文也涉及相关问题,惜未睹其详,不便妄言。

以上是就学术界对于两宋乡村基层政权、组织体系及社会控制等相关问题研究的回顾,限于学识,加之客观条件的限制,难免挂一漏万,但大致能反映出近一二十年两宋乡村政权及其社会控制功能的研究概貌。

## 二、成绩与缺憾

从这一学术史的回顾中可以看出,近一二十年学界对两宋时期乡村基层政权的研究有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就学术界对于相关问题的具体研究和探讨来看,截至目前,应该说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围绕两宋国家政权为了实现对乡村社会统治与管理而出台的一些重要制度,展开了不少的探讨和论证。就整个学术进展历程而言,保甲制成为重点研究的话题;其二,是对两宋乡村政权赖以存在和运转的各种行政组织的历史渊源、发展演变以及相互关系,做了诸多考证和讨论,情况较为多样;其三,基于赋役制度研究,对两宋乡村基层政权各级、各类组织头目进行了诸多剖析,特别是对乡村政权各种头目的选差、任职及相关变迁有较多的探讨。就研究成绩而言,也是很值得称道的。概言之,首先是对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运用。众所周知,与某些制度资料较为丰富的情况不同,由于历代正籍、典章关于乡村制度的记载较少,有者也属零散条目,较为详备的专门资料少之又少,这就使相关研究面临较多的客观限制,两宋自不例外。研究者们经过披沙拣金的资料搜集和问题探究,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其次,经过不断的探研,学界对两宋乡村基层政权与社会控制的基本脉络,在认识上不断提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从“富民阶层的兴起与乡村基层政权互动的角度来探讨两宋乡村社会管理与控制的问题,成为一段时间的新动向,较有启发意义;对民间力量与政权互动问题的研究也逐步展开。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学术界对于两宋乡村基层政权及其社会控制问题的研究的不足和缺憾仍然是存在的,困惑之处也不算少。就以本人的粗浅认识而言,在以下几个方面还较为薄弱,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一)对两宋乡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思想及理论方面的探究稍显不足,这方面牵涉到两层意思。一方面,我们应该明确,作为一种长期而非临时性的制度建设,是不可能没有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的。钱穆先生就曾讲过:“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sup>[3]</sup>就各种情况来看,研究者多集中于大的方针政策的论述,而对乡村政权的相关思想、理论细究不够。实际上,作为一种历史长时段的制度安排,国家政权赖以维持的基层存在形式,不能不服从于国家的大政方针,但也有自己层面上且掺杂了很多民间层面的思想和理论成分,不具细地对它的相应思想和理论基础进行认真的探究,仅对政权组织本身进行考证和叙述,恐怕很难对此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的阐释。另一方面,对于一种政权实态的探讨,本身是一个富有交叉意义的论题,如果缺少相关理论的运用,比如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视角进行必要的理论分析,就会使研究显得比较单薄。因而学界对两宋乡村基层政权设置及其实施社会控制的思想探究和理论考察是不够的。不过,在最近的研究中已经有人逐步注意到此类问题,也反映了进一步加强理论运用和理性思辨的必要性。

(二)就乡村政权与相关组织的性质及其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有各种说法,但仍未有令人信服的结论。研究多以发展过程梳理为要,而不注意从乡村政权的组织安排及其性质方面做出明确区分,就很难将繁杂多变的组织体系及其控制机制辨析清楚,最终笼统言之,不甚了了。而在研究者所共同认可的乡村政府性组织与其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及功能的发挥情况,也是较为含混的。诸如政府性组织与一些显性的民间组织的关系,与乡村社会其他各种隐性的非政府力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目前来看,还是一个薄弱环节。有的也只是在探讨各民间组织时偶有涉及。另外,关于乡村政权组织头目的探讨,也存有深入探讨的余地,诸如各个头目与政权组织的对应关系及其职掌等问题。

(三)关于乡村政权社会控制机制的具体运行状况还存在不少研究空缺。从具体的研究来看,研究者多注重制度性的规定和典章条文的考实,相对忽视实际运作过程的研究,即重静态而轻动态。这显然难以展示两宋时期乡村基层政权及其社会控制功能的复杂态势。实际上,乡里制度并不是静止不动的条文规范,而是动态的由多种力量运动而成的信息系统。加之整个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乡村政权运作过

程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是远远超出具体的条文规定的。古往今来,无数经验事实表明,典章制度是一回事,具体执行情况又是一回事。要想使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更贴近客观政治实践的历史实际,使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更有价值,就必须加强对政治体制的运行机制、对政治制度执行情况的研究<sup>[4]</sup>。相对于秦汉和明清等其他断代研究的情况来看,宋史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显得较少。无论是史料挖掘的广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还不够,一些问题还模糊不清,有些结论也还值得商榷。这虽然与唐宋鼎革之际乡村社会及政权建设的复杂性有关,但研究上的力度不够也是不容回避的。

(四)对于乡村政权在实施乡村社会控制的绩效问题,还有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虽然此前的研究围绕保甲制等问题有了一些积累,这相对于乡村社会控制的复杂系统来说,还是很不够的。而且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一些研究者仍把政治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这不能不对研究产生影响。即如对乡村政权头目在社会控制方面的关注,多站在阶级、政治的角度研究其与农民的关系,往往将二者对立起来,事实上,从文化深层模式的角度观之,农民与乡里组织领袖具有同一性质,他们的理想、价值和心态都具有一致性,乡里组织领袖本质上就是农民<sup>[5]</sup>。二者的控制与反控制往往较为复杂,

不能简单论之。而且,文明社会的人总是要受制度制约的,如果没有一套政治制度来管理公共事务,其局面是不堪设想的<sup>[6]</sup>。基于此,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还没有深入到相当的程度。

总之,如果我们细加分析,就会发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此前的研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与两宋之际乡村基层政权及其社会控制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鼎革之际理应包含的更丰富的内容相比,还是存有差距的,而研究时段和内容上的不平衡性也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以上所述所论,仅为一管之见,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参考文献:

- [1] 陈寅恪. 陈垣 敦煌劫余录 序, 金明馆丛稿二编, 三联书店, 2001, 236
- [2] 姚兆余.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J]. 中国农史, 2002, (3).
- [3] 钱穆. 中国历史研究法, 2001, 33.
- [4][5] 赵秀玲. 中国乡里制度研究及展望 [J]. 历史研究, 1998, (4).
- [6] 白钢.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J]. 历史研究, 1996, (6).

作者简介:朱奎泽(1970-),男,甘肃西和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古代史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康亚钟;校对:亚中

(上接第 174 页)

- [14] 侯运华. 论明代狭邪小说 [J]. 新乡师专学报, 2002, (3).
- [15] 曹萌. 论明代中期色情小说的流水式结构模式 [J]. 学术界, 2003, (3).
- [16] 张国星.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前言 [A] /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3.
- [17] 纪德君. 明清通俗小说创作中的浊流 [J].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3, (4).
- [18] 潘建国. 明清艳情小说结局模式的宗教分析 [J]. 中州学刊, 1997, (4).
- [19] 刘书成. 艳情与巫术共同孕育的一个“怪胎”——灯草和尚传的宗教文化形态解构 [J].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3, (6).
- [20] 刘书成. 明清艳情小说与道教房中文化 [J]. 甘肃社会科学, 2003, (1).
- [21] 刘书成. 明清猥亵小说中“纵欲——顿悟——出家”情结模式的佛教文化根基 [J]. 西北师大学报, 1999, (2).
- [22] 万晴川. 论房中术对明清小说的影响 [J]. 晋阳学刊, 2000, (1).
- [23] 谢桃坊. 明清艳情小说的文化意义 [J]. 社会科学战线, 1994, (5).
- [24] 刘琦、郭长海. 明清艳情小说的基本类型及其发展轨迹 [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7, (4).
- [25] 谢真元. 对男权中心的文化批判——略论《金瓶梅》《肉蒲团》性描写的象征意义 [J]. 社会科学研究, 1996, (6).
- [26] 周晓琳. 明清艳情小说性描写的文化心理解读 [J]. 船山学刊, 2004, (3).

- [27] 高罗佩. 中国古代房内考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28] 刘达临. 中国古代性文化 [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
- [29] 昝雯. 四大禁书与性文化 [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1993.
- [30] 江晓原. 性张力下的中国人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31] 吴存存. 明清社会性爱风气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 [32] 何满子. 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 [M]. 上海:上海书店, 1999.
- [33] 陈益源. 小说与艳情 [M].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0.
- [34] 马克梦. 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 [35] 孙绍先. 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36] 赵益. 明代艳情小说中的道教角色及其所反映的性别意义 [A] / 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 [37] 许美华. 明清艳情小说对当代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 [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7, (3).
- [38] 汪汝梅、张羽. 中国小说理论史 [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1.

作者简介:黄廷富(1977-),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博士生。研究方向:明清小说。

责任编辑:赵国军;校对:阿布都